从间接认识到直接认知——浅析近代英国中国观的渐进变化

徐梦倩
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近代英国对中国的认知完成了从间接听闻向实地直接接触的历史转变，18 世纪是这一认知演化的核心转折点。18 世纪以前，英国主要依靠欧洲传教士等人间接认知中国，整体心态以好奇与崇拜为主。18 世纪中英商贸往来日趋频繁，英国人得以实地考察中国，认知进入直接平视阶段并开始理性批判其政治制度的弊端。19 世纪，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并开启全球殖民扩张，伴随一系列事件冲突，其对华认知彻底转向轻视与蔑视，晚清在英国人眼中沦为制度腐朽、社会落后的封建国家。本文将以时间为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近代英国中国观的渐进变化，结合政治方面来剖析认知转变的时代背景、具体特征与历史影响。

关键词：近代英国；中国观；渐进变化

From Indirect Knowledge to Direct Perception: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Gradual Evolution of Britain's China-view in Modern Times

Xu Mengqia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Zhejiang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Modern British perceptions of China underwent a historic transition from indirect hearsay to direct field observation, with the 18th century as the decisive turning point. Before the 18th century, Britain understood China mainly through European missionaries, maintaining an overall attitude of curiosity and admiration. Frequent Sino-British commercial exchanges in the 18th century enabled Britis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s, bringing their cognition into a direct and objective stage alongside rational criticism of China's political deficiencies.In the 19th century, fuel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global colonial expansion, Britain's China perception shifted completely to disdain amid successive Sino-British conflicts.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regarded as a feudal regime with corrup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backwardness. Adopting a chronological approa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hree-stage evolution of modern British China views and analyzes the contextual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s of such cognitive changes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Keywords: Modern Britain; China view; Gradual evolution

0 引言

本文主要依照 18 世纪前、18 世纪、19 世纪三个历史分期展开考察，梳理英国人从间接转述到实地经历，结合他们各个阶段的社会背景，逐步形成了对其在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观念转变。结合传教士书信、使团游记、政客外交文稿等一手域外史料，深挖认知转变背后的时代背景，以此揭示英国各类对华外交、军事举措背后的思想认知根源。

在研究设计上，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不同阶层英国人的评判横向对照，把认知心态的变化和英国对华策略调整相结合展开分析。但研究也存在客观短板：核心史料均出自西方作者之手，自带主观立场，缺乏中方文献互证，部分细节分析存在局限。研究过程将综合运用三种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梳理法整合各类涉清政治记述，依托历史比较法区分三个时期认知特征，辅以定性分析法，立足英国君主立宪的制度视角拆解其对中国政治从推崇到中立再到鄙夷的心态流变，完整还原这条认知转变脉络。

1 18 世纪前英国间接认知中国：好奇崇拜

在 18 世纪以前英国与中国的交流大多是凭借着各种间接的渠道获取彼此的信息。“当时欧美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源是西方的传教士，这种情况几乎延伸到了 19 世纪末”[1]，这导致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知之甚少。这一时期的

英国社会带着崇拜的目光将中国塑造成了一个政治开明的东方理想大国。

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们在著作中常常提到“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他们认为中国的君主虽然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同时也推行仁政。在利玛窦的描述中，中国的皇帝被臣民们称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因为他们奉天为至高无上者，所以天子和神子是一个意思。在日常谈话中，人们称他为皇上，意思是最高的统治者或君主，而其他低级的统治者则用官这个低得多的称号”，皇帝还能集权有效管理地方，维护社会稳定。但同时他们也发现虽然中国的皇帝拥有这样的绝对权力，但仍会听取臣子的意见，“如没有与内阁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2]。他们所看到的“中国皇帝愿意为了善政去听取曼达林（即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官员的称呼）的意见”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西方传教士记载的中国君主统领下的中国似乎成为了西方哲学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国度。当时的中国所采用的文官制度与西方不同，英国早期官职被土地贵族等垄断，而中国则是在强调能力选举，分配官职。杜赫德将这一制度标榜成符合西方哲学家的生活追求，这样的政府工作正是西方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事。西方学者惊讶于此制度并受此影响，争相提出能力优先的口号，强调官职并非私有产物而是公共岗位，为后面英国改革官制提供思想参照。

对于西方传教士而言，不仅仅是制度的公平性令人惊讶，这一制度下衍生的产物也具有独特的魅力。“那些在争取更高学位当中被命运带到了一起的人们，在此后的一生中都彼此以兄弟相待。他们之间相互有着和谐和同情，以各种可能的方法互相帮助。”他们将和谐的官场人际关系作为选官制度的衍生物。他们对这种牢固的隶属关系中的“人情往来”也多以正面的形式描述，“下级十分尊敬他们的上司，殷勤地拜访他们，在某些时候要送上礼物”。中国官员进入官场后也存在成绩考核，中国官员每三年要进京觐见述职，官员如若存在问题“受到处罚，有些受到贬斥，并开除职责”[3]，以激励与处罚的形势维持着统治天平的平衡。英国后续仿效中国的选官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引入客观的考核标准、评判准则。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选官制度更加进一步地为中国在英国的印象中更加具有先进性。处罚官员并不是仅凭一言之词作论断，西方传教士指出中国的司法制度中有一项内容比较特殊就是注重证物、证人证词等一系列能证明犯人罪行的内容，在中国基层治理中也是如此。伯来拉认为与他印象中的司法程序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大堂上始终挤满百姓听证人发言，所以只记录真实的情况……我们那里，证人的话只说给审判官和公证人听，因此金钱等等的力量是大的”。他评价的大抵意思是，这是一片公理之地，不仅仅是司法程序如此，他认为司法过程中管理岗位也具有公理性，“这些异教徒在这方面是多么超越基督徒，比他们更讲公道和事实”[4]。此时西方对中国的司法制度几乎也是以正面的形象讲述。

在西方传教士的眼中，中国始终是以一个神秘集权、先进、具有公理的强盛东方大国。他们把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带着自己的利益目的倾注到自己的著作当中，并在欧洲大地上传播开来。于是，18 世纪前英国得到对中国的间接认识，虽初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的轮廓，但由于信息存误及有文化隔阂，此类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跟误解。而凭借信息的传达，就总体情况而言，能获知中国信息的少数英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是既好奇又赞赏。

2 18 世纪英国直接认知中国：平视尊重

英国基于西方传教士著作的描述对遥远的中国形成了一种神秘又美妙的想象，这种认知弥漫着模糊与错误认知。随着渠道及方式的多样性发展，英国开始更深入、直接地认识中国，贸易成了直接认知的关键途径。在当时时代棱镜和英国发展下生长的文明优越感的映射下中国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将仰视中国的视角发展形成平视尊重的态度，并含有不断向下发展的趋势。

18 世纪的英国已经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但此时中国仍然实行专制，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他们仍旧认为皇权至上。但是专制的羽翼遮蔽住了中国平民百姓的双眼，这是自由理性土壤养育出来的灵魂无法接纳的，“中国政府垄断这方面的知识，随时将要发生的一些天象以一种庄严的方式通知群众，藉以在他们中间树立自己的威信”，想要在社会中形成统一的声音，以天象为媒介统治人民。统治阶层对知识的垄断现象让英国使团认为“他们无法把这种复杂现象计算出来”[5]。维系中国知识生命体系的一大制度——科举制，它的考核单一性也减少中国人才出现的可能性。但他们也考虑到这是为了去配合中国自身的特色，“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法律、同一种方式交流感情”[6]，为了这种统一性，科举制发展具有一种必然，思想僵化也具有一种必然。18 世纪的英国人不否认中国文官制度具有公平性，“在中国，考试是一件隆重的大事，执行得相当认真公正”，但小斯当东访华过程中所闻“事实上富人子弟受教育的机会比穷人子弟多”，这也是一种上层对知识垄断的形式之一，只是

给穷人中的天才开辟了一个渠道。

18 世纪期间，英国政治家逐步已从理性的视角去看待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再高度仰视。小斯当东跟随马戛尔尼的船队来访华过程中，他如此讲“欧洲来到中国，他们不再像是最初欧洲人写的游记上那么羡慕了”[7]，英国使团回国后纷纷著书立传，在当时英国政坛、商业等各界产生一阵反响，羡慕追求的声音逐步在蒸汽机械的声音中慢慢淹没，另外一股略显轻视的欲望之声弥漫开来。

3 19 世纪英国直接认知中国：轻视蔑视

英国在 18 世纪对中国的大致态度——平视尊重。而随小斯当东跟随的马戛尔尼使团后，中英关系出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英国对中国的态度急转直下。他们坚定地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科技水平和民众素质都无法与自己国家相比。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英国对华政策，造成英国在 19 世纪对中国呈现出侵略、剥削的态度。

马戛尔尼使团的特使们访华回国之后，开始发表自己对于中国的言说。19 世纪，国内的外国人也所描述的中国开始趋于负面性。在华的传教士创办了英文报纸《中国丛报》中引用了一句一个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话语：“老实说，广州政府的官吏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8]，“禁鸦片的法律是严厉的，但贸易仍相当公开”[9]。慢慢地，西方人对官吏腐败、鸦片盛行的中国这一层社会面貌已是见怪不怪了，甚至会夸大言辞进行批判。他们将这一现象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目的，助力他们对中国企划的实现。例如，英国外交家巴麦尊在 1853 年的议会演讲中，大肆宣传中国的政治腐败、官员贪污是普遍现象，导致了中国无法进步、始终停滞的一大原因。于是 1836 年，英国将国内工业界的力量投入到对华激进政策里，在众多因素的推动下爆发了鸦片战争。而在此之前，就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英国更想通过外交手段来与中国进行合法贸易，打开中国市场。1816 年的阿美士德使团也是出于此目的来进行访华，可惜并未达成一致。英国人利用制度缺口腐蚀中国的支系，为破除英国所陷入的贸易困境“贸易就势需听由行商或中国官吏摆布，动辄加以封禁”[10] 提供“利器”。林则徐将英国代表义律关入商馆，火烧鸦片货物的行径，被利用为战争的借口，这是因“没有近代外交观念，将其仍看作是‘大班’”[11]，“林钦差的所作所为被视作一种宣战，英国派出战舰和军队只是为自己的国民争取正当的待遇”[12]。林则徐的外交观念可以浓缩成为是当时大部分中国官员对国际外交活动的认知特点。中国官员常上报的外交或其他涉外内容不符实，“1858 年广州失陷后，大量官方档案落入英国人手中，其内容似乎证明了鸦片战争中中国人的表里不一”[13]，密迪乐认为这个现象可以被很好地利用。正因此缘故，中国官方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常出现问题。18 世纪末发生轰动的“休斯夫人号事件”以洋人一命抵一命为结局，英人认为这是“政治恐吓手段”，但中国还在天朝上国的观念中沉溺，并不知道高速发展的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水平在变，行为方式也在变。于此，英国持续质疑中国涉外司法，这也成为了鸦片战争前后要求领事裁判权的重要借口。

英国学者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对中国法的认知趋于平稳，但却掺杂着对中国法的轻视和自身法律的确信，以此形成了“西方法学中心主义”。杰弗里就曾提到中国政府“独裁专制，普通人的交易习惯，长期沉湎于太平盛世，缺少与其他国家的交流”[14]，强调未来需要改变的是中国，而不是西方。虽话中带着启示中国的味道，但也带着时代的傲慢。

英国人以自身制度为“文明标尺”，看待中国的政治制度带着强烈的自身优越感。19 世纪的英国人对中国的批判不再具有理性的重色，而是具有极强的邪恶双重标准。他们虽然批判清朝酷刑、专制，但自身殖民地推行的是更残酷暴力的统治；指责清朝司法不公正，拒绝本国国民接受属地法律管辖，本质是在追求特权而非追求公平。所谓的“弥补制度缺陷”也只是西方常见的普世主义的噱头。

4 结语

本文以时间为线索，系统梳理了英国在不同渠道下逐渐对中国形成不同阶段的认知。纵观三阶段心态流变，不难发现，英国对中国政治的评价从来不是客观中立的学术判断，后期认知转向的底层逻辑是英国经济扩张与殖民利益的现实需求。从崇拜到平视再到轻视的心态变化，完整映照出中西国力此消彼长、国际秩序剧烈重构的近代历史进程。这段跨文明认知冲突的历史具备长久现实价值。它警示各国应当摒弃发展下的文明优越论，不能以自身制度作为评判他国的唯一标准，也为当下处理中英双边关系、推动多元文明互鉴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同样地，我们自己应该主动靠近时代的洪流，而不是被动纳入其中，积极学习、积极发展，以客观友好的态度与其他国家交往，坚持求同存异的核心理念。

参考文献：

[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意）利玛窦，金尼阁.《中国札记》[M]. 何高济，

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

[3]（葡）曾德昭.《大中国志》[M]. 何高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4]（英）C. R. 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M]. 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19.

[5]（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 叶笃义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6] 傅军.《“东学西渐”与西方的兴盛》[J].《中国经济》，2009(10):10.

[7]（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 叶笃义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8]（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 康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9]（英）奥朗奇编.《中国通商图：17−19 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M]. 何高济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10]（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 康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7.

[12]（英）普尔，狄更斯.《巴夏礼在中国》[M]. 金莹译，上海：中西书局，2011.

[13]（英）约 · 罗伯茨编.《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M]. 蒋重跃，刘林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英）杰弗里.《小斯当东英译 < 大清律例 > 述评》[M]. 亚骏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

作者简介：徐梦倩（2002.09.22），女，汉族，浙江宁波，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学科教学（历史）。